

談談分类表的标记制度問題

廖 延 唐

一

分类表的标记制度，曾經有过一些討論，“图书馆学通訊”五九年第七期有兩篇文章，就是討論标记制度的。那兩篇文章主要討論采用混合号碼还是單純号碼的問題，沒有更多的涉及到号碼的編制方法。这里，我們談談編制号碼的方法，当然，有时也会涉及到采用混合号碼还是單純号碼的問題。

我們知道，經常所談的好标记制度，要求达到簡短、易記、易讀、易写、有伸縮性。但这还是不够的。好的标记制度，还必須要求能够保証突出分类体系的思想性。要达到这样一些要求，固然，跟所采用符号有直接的關係，但主要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号碼的編制原則和方法。号碼編制得是否合理，对分类法的是否方便使用有直接關係。

从分类工作的实践来看，号碼过于复杂和冗长，会給分类工作帶來不便。作为一部分好的分类法，思想体系是主要的，但号碼的編制技术同样不能忽視，因为标记制度的合理与否，与分类工作有着无可非議的直接联系。

从讀者的角度來考虑，标记符号簡短、易記、易讀、易写也是有必要的，因此在号碼的編制上必須从工作、从讀者的需要出发，决不能在号碼的編制方面追求不必要的形式和技术。当然，这里并不排斥必要的号碼編制技术問題。

分类表的标记制度是一种形式，一定的形式是为一定的內容服务的，标记制度就是为分类体系服务的。在形式和內容的關係中，內容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一方面，也就是說內容决定形式。在分类法里，分类体系发展要求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形式，要求这种形式对內容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形式和內容是互相依賴和互相影响的，首先是內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內容，限制着內容的发展。标记制度这种形式，必須要能够积极地表达分类体系的內容。由于科学的发展，分类体系的內容也将随之得到不断的发展和丰富。标记制度这种形式一經产生之后，就成为相对固定的东西，而落后于內容的发展的。所以“号碼虽然給分类表帶來以极大的便利，却同时也給分类表以极大的限制”^①。这就要求我們辯証的来看待內容和形式之間的關係，我們的任务是要在最大的限度內使形式能适应內容发展的需要。

二

从分类号碼的編制方式来看，可以分为层累制和順序制。順序制把一切上位类，下位类和并列类都用順序的方法配置号碼，这种方式只能把某一类是什么号碼加以固定下来，絲毫不反映类目的級位。这种办法开展困难，加上类号与类目缺乏必要的联系，現代图书馆很少采用这种方式来編制分类号碼，这里就不談了。

层累分类号在編制方法上使类号的位数反映出分类表的邏輯結構。第一个符号表示基本大类，第二个符号表示第二級，第三个符号表示第三級，余类推，如：

H 文化、教育

- 2 社会文化事业
- 21 科学研究事业
- 211 中国科学研究事业
- 2111 科学研究的方針政策
- 21111 中国科学院及其所屬机构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类号是严格反映类目的級位的，这里 H 是第一級、H2 是第二級、H21 是第三級、H211 是第四級、余类推。

层累制能从类号中反映类目的級位，对于类号的助記，也有一定的作用。“邏輯的編号給建立充分反映本概念与更广泛的概念完全同等的类号提供了技术上的方法”^①。无疑的，层累制的編号方法在使类号达到具有伸縮性、助記性方面是有一定作用的。

但有人在談到层累制的优点时，过分強調类号严格反映类表的邏輯結構。并且認為：类号不严格反映类目的級位，就和順序号沒有什么区别。我們認為，这种看法至少是不够全面的。

类号要求严格反映类表的邏輯結構，必然导致类号过于冗长，“如果我們企图在号碼內反映出本概念从属于更广泛的概念的一切等級，則号碼就会变得更加长些”^②。这是和編制类号簡短的要求相違背的。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人大法”）的类号是采用严格层累制的方法編制的。由于类号严格反映类目的級位，因此体系的层次越多，则类号越长，如：

- 13.44 有机化学
- 3 系统有机化学
- 25. 杂环族化合物
- 3 五节園化物
- 1 一杂園系

上表的类号一共七級，由于类号是按严格的层累制来配的，在第七級的类号中共有 13.44325.31十一位数（这个例子不是最突出的，有的五級达到了十一个符号，三級达到了九个符号）。“人大法”全部只有 5,944 条类目（根据“对于大型分类法所采取的標記符号的意見”一文的統計，載“图书馆学通訊”1959年第九期）在第七級类目中有这样长的号碼。如果一部比“人大法”詳細得多的分类法，类号采用严格层累制，号碼的冗长就会給图书馆工作者和讀者帶來很多困难。我們感到，类号严格反映类表的邏輯結構是沒有必要的。“号碼的邏輯性不是我們的目的本身，而是輔助工具。因而，为了不創立过多的等級和不延长类号，我們有时在号碼结构中允許違反邏輯性”^③。

有人認為：“人大法”类号的編制方式不是严格的层累制。并且舉例說：为什么“41世界經濟”后面的“中国經濟”是42；“11.2世界史、革命史”后面的“中国历史、革命史”、“苏联历史、革命史”的类号是11.3、11.4；“中国語言文字”，“中国少数民族語言文字”，“亚洲語言文字”，“苏联語言文字”、“欧洲語言文字”的类号是 91、92、93、94，

95。如果是严格层累制的話，“世界經濟”的号码是41，“中國經濟”的号码就應該是411；而不是42；“世界史、革命史”的号是11.2、“中国历史、革命史”、“苏联历史、革命史”的类号應該是11.21、11.22，而不是11.3和11.4，余类推。

我們認為：严格层累制是指类号反映类目的級位來說的，不能脫离类表的邏輯結構來談类号是否严格的层累制。类表的体系安排，考慮到突出类表的思想性和实际需要，可以将“中國經濟”与“世界經濟”并列；“中国历史、革命史”、“苏联历史、革命史”与“世界史、革命史”并列。从理論上分析，“中國經濟”自然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中国历史、革命史”、“苏联历史、革命史”也自然是“世界史、革命史”的一部分，至于他們在类表中如何組織是类目的安排問題，我們考察类号是否严格层累制應該看类号是否严格反映了类目的級位。类目之間是平行的關係，类号則是同級的；类目之間是从屬的關係，类号則是不同級的。既然“中國經濟”与“世界經濟”，“中国历史、革命史”，“苏联历史、革命史”与“世界史、革命史”在类表体系中是并列的關係，为什么要求类号是从屬級的關係呢？如果否定了“中國經濟”与“世界經濟”；“中国历史、革命史”，“苏联历史、革命史”与“世界史、革命史”并列的正确性，那就是分类体系安排的問題了。与号码的严格层累制有什么關係呢？如果按照上述看法的人来配号，把“中國經濟”的号码配成411，把“中国历史、革命史”、“苏联历史、革命史”配成11.21、11.22这反而不叫什么层累制了。因为这样做，并沒有严格的反映类目的級位，这种把类表，类号互相割裂，大談严格的层累制，肯定說是不全面的。只顧号码的层次，而不顧类目的級位關係，这才叫做严格的层累制，这是对层累制的一种歪曲，也是难于使人理解的。

有人認為：层累制的編號方式有助記性，我們也同意适当吸取层累制的这个优点。但必須明确，助記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絕對必須遵守的原則。符号是一种工具，要服从类目的体系和实际工作。我們必須考慮它的实用性質，而不要單純从系統上来看。要求从类号来看类的級，这从理論上来分析和从实践中来考察也都是不太必要的。編制类号要求达到簡短，易記，易写，有伸縮性等。在这些要求中，也是有矛盾的，例如：系統性和簡短就有矛盾。但要考慮，主要是服从那个要求，四級类目給三个号码有什么不好呢？“科学概念的邏輯在图书号码中絕對精确的反映实际上是不必要的”^②。虽然从类号看等級不便，但对工作并沒有什么損害。层累制所帶來的助記性，在一定类目的范围内才起作用，任何分类工作者在分类时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把反映类目級位的类号全部背熟，从图书出納的角度来看，类号严格反映类目的級位，就更沒有意义了。一般的只能記住每个大类的符号，以及主要类的二級类的符号，取还图书时主要是依据号码的次序，而无須考慮这本書在分类体系中是多少級。如：

- 71 文化教育行政
- 711 中国文化教育行政
- 1 文化行政机构与組織領導
- 1 中央文化行政机构与組織領導
- 1 文化部

在取書时，只按71、711、7111、71111、711111的次序去取，而无必考慮71是第二級711111是第六級。从讀者的角度來考慮，严格的层累制更是沒有什么意义了，沒有任何讀者借書时需要了解这本書的类号是多少級。

衡量一种标记符号，应从对工作是否有利出发。既然，严格的层累制不能给图书馆工作者和读者带来方便，相反的而是困难，那么，采用这种方法就是不符合客观需要的，强求类号严格反映类目的级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表现。

谈到标记符号，助记性是特别被强调的，助记性强的标记符号，在进行分类时，相对可以提高一些工作效率。如果过于强调助记性，必然造成类号冗长；这也是我们编制类号时需要考虑的。

一般谈到助记性，总要涉及到主表与附表的号码是否要一致的问题。这里，首先谈一下附表的作用。

附表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表，它的主要功用是把各类内容和形式相同的类目概括出来；由于它是各同类目的概括，运用附表就可以在各类开展细分。附表的设置，可以在本表中免去相同类目的重复，从而缩小分类表本身的篇幅。

由于附表是各同类目的概括，它本身就有助记性，这一点是必须特别强调的。有的同志在阐述附表的意义时强调“附表和详表不一致，附表的意义究竟何在”^④。附表在与各主表体系安排不产生矛盾和不使类号增长的情况下，强调主、附表的号码取得一致是可以的，不然，就无须强调主、附表的号码取得一致。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科院法”）附表中中国的号码是2，我们不能要求在主表中任何场合中国的号码都是2，例如该法“中国哲学史”是13，“中国国内贸易”是43，这样做是合理的，如果要使它与附表的号码一致，通过配号方法的处理，还是可以做到的，无非是把号码拖长，从要求号码简短出发，这样做是不必要的。

是不是主、附表的号码不一致，附表就没有意义了呢？前面已经说过，附表本身就有助记意义，这种助记意义并不是和主表号码一致后才产生的，而是从它概括各同类目本身就已经具有了。附表本身的主要功用是便于各类细分，而不是它的主表类号一致所产生的助记性上。过于强调主、附表的类号一致，而贬低附表本身的作用，这是不全面的。

大类的符号采用字母还是数字，目前有不同看法，为了使大类的符号清楚、简短、易看，我们认为还是采用拉丁字母好些。如果采用数字，必定要采取一些变通办法，因为数字的基数只有十个，用数字的基数来标示大类，就目前现行的分类法来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下面来比较一下“中小型表”、“科院法”、“人大法”标示大类的符号。

中小型表	科院法	人大法
A 马克思列宁主义	00马克思列宁主义	1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
B 哲学	10哲学	2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附：宗教、无神论
C 社会科学总论	20社会科学（总论）	3社会科学、政治科学
D 历史	21历史、历史科学	4经济科、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E 经济	27经济、经济科学	5国防、军事
F 政治、社会生活	31政治、社会生活	6国家与法、法律科学
G 法律	34国家与法、法律科学	7文化、教育
H 军事	36军事、军事科学	8艺术

I 文化、教育	37文化、教育	9 語言文字学
J 語言文字	41語言、文字学	10 文学
K 文学	42文学	11. 历史、革命史
L 艺术	48艺术	12. 地理、經濟地理
M 宗教、无神論	49宗教、无神論	13. 自然科学
N 自然科学总編	50自然科学(总論)	14. 医药、卫生
P 数理科学和化学	51数学	15. 工程、技术
Q 地質、地理科学	52力学	16. 农艺、畜牧、水产
R 生物科学	53物理学	17. 綜合参考
S 医药卫生	54化学	
T 农业技术	55天文学	
U-Y 工业技术	56地質、地理科学	
Z 綜合性图书	58生物科学	
	61医药、卫生	
	65农业科学	
	71技术科学	
	90綜合性图书	

从以上三个表可以看出：大类的类号最简短和醒目的是“中小型表”。在大类里，基本上以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大类，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因为“工业技术”一类分配了五个字母，这种处理方法，也是从类号的简短和发展的需要出发的。这里也可以看出，严格的层累制在第一度分类中就有必要突破，不然，拥有大量书籍的“工业技术”类的二级类目，号码普遍要长一位。这种适应情况的处理办法是合理的。

“科学院法”采用数序制，用双位数字标示大类，这种办法可以适应大类的发展，看起来也是清楚的，但这种办法与“中小型表”比较，大型号码普遍要长一位，而且双位数字所代表的类目在很多情况下已经不是基本大类而是二级类，这首先给大类的助记造成困难。例如：当读者问“历史”的号码是多少？馆员必须回答是21—26。再如：问“文学”的号码是多少？馆员必须回答是42—47，因为仅仅回答“历史”是21，文学是42，是不够全面的。

“苏联图书分类法草案”的基本大类符号不用数字而用字母是从简短的原则出发的。大类号码短一位，用同样的开展方法，以下的类号都短一位，这是无须加以说明的。大类的号码短一位和长一位这是和大类采用数字还是字母来标示是紧密联系的。苏联在编制“苏联图书分类法草案”时，对于标示大类的符号很细致的进行了研究“用一位数字来标示第一级类目是非常不够的，用两位数字来标示又过于宽阔。若用两个数字标记第一级类目则或者使行列延长，这是为小型图书馆所不能允许的，或者造成许多两位空白数字，并同时使号码加长……所有这些理由迫使我们放弃了采用数字而以字母作为基本大类的号码”④。

傑斯林科同志所指的“过于宽阔”，是指用1—99来标示基本大类。用1—20或1—30来标示基本大类则“造成许多空白数字”。

“科学院法”考虑到了“空白数字”的问题，为了使双位数字能尽量利用，它不仅标示大类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标示二级类，这虽然解决了“空白数字”的问题，但“行列延长”的

問題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标示大类的号码变得不明显和难于助记。

“人大法”用数序表示同位类，大类的标示也是数序的。数字单、双位都有1—17.。代表十七大类“每一位号码，即代表一类，如遇双位一类后面注‘点’表示仍然代表一类”。这种办法类号很容易混淆例如“11.31中国民族史”“1131 1844年以前马克思胚胎时期著作”。如果大类开展到20类以上，混淆的可能性就更大了。用小圆点来表示同级类的办法是值得研究的。

关于单纯号码和混合号码的优缺点，在“关于混合分类号的一些意见”一文（载“图书馆学通讯”1959年第七期）有较全面的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三

如何保证突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和政府的政策、决议和指示，这不仅在分类体系安排上要加以充分考虑；而且在标记制度上也必须加以充分考虑；如果只是在体系安排上突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党和政府的政策、决议和指示，这还是不够的，必须在标记符号方面加以充分保证才能达到突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政府的政策、决议和指示。我国现行的几部分分类法在突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各个分类法在体系上都尽力做到突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例如：“人大法”1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科学院法”“00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小型表”“A 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大法”“A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二级类目中有的列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学”的类目“人大法”“武大法”“中小型表”都是这样做的。有的是通过附注说明和附表来解决，“科学院法”就是这样做的。

为了更好地说明标记制度表达分类体系的积极意义，我们来分析一下“人大法”“科学院法”在各类中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处理办法。

“人大法”为经典著作参见各类有的立有专目，有的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学”的类里。例如：

5(2) 毛泽东著作与军事科学

注：毛泽东军事著作及其解说入15有关类目，在此处参见卡片。

7(1)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和文化革命的学说

• 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论述文化与文化革命的著作入此，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和文化革命的原著入1大类在此处参见卡。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5(2)一目收毛泽东有关军事著作的参见卡，7(1)一目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参见卡，同时也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论述文化与文化革命的著作。

“人大法”在基本大类里也是收书的，这在有关大类下有说明。如：

3 社会科学、政治科学

注：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综合著作，一般性社会政治评论等入此，但专门性社会政治科学问题入有关类目。

从上例結合類表看來，儘管給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參見卡設有專類，但並不能保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在各類突出反映。“5(2)毛澤東著作與軍事科學”這個類目的位置就無法突出，再加上標記制度沒有很好的配合，它已經處在一大堆非經典著作的後面了。各類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學”雖說位置比“5(2)”好一些，但也不能解決突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的問題，因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學”一類中有很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研究××學的著作，如果本類可以用特定著者號或書次號解決。那麼，“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學”的上位類是基本大類，在基本大類中收綜合著作的書籍再加上用總編復分表的書籍，這就使得僅有的為數不多的經典著作參見卡處在很不顯著的地位了。

“科院法”為了將經典著作同時反映在各有關類目，如恩格斯的“自然辯証法”應在自然科學內反映出來。這除按內容作互見片，排入有關類目外，並以“00馬克思列寧主義”類中“個別著作及專題彙編”的類號作為著者號，例如：“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分入宗教類，其互見號為49/01.3。黨和政府的政策法令除在有關類目反映出來外，其他類目用附表號碼表示。“科院法”這種處理辦法，也有“人大法”類似的問題，這裡不再重述。

武漢大學圖書分類法（以下簡稱“武大法”）在各類突出“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學”、“毛澤東××學說”、“黨和政府的政策、決議和指示”，是從分類體系和標記符號兩方面來考慮的，這樣，就使得在各類突出上述著作前進了一大步。

“武大法”在分類體系和標記符號方面採取了以下措施：

1. 基本大類和二級類目下有“一般著作”一目，需要細分時上位類不分書。
2. 各類進行總論復分時在“一般著作”里進行復分。
3. 在號碼配置上“一般著作”從1開始，而經典著作從0開始，為了便於分析，我們看以下例子：

J 文學

- 01 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艺理論
- 011 毛澤東文學說
- 1 文學理論與研究一般著作
- 2 中国文学
- 2011 毛澤東文學說
- 2012 党和政府的文艺政策、決議和指示
- 21 中国文学理論與研究一般著作

“J文學”這個類目，小型圖書館如不再往下細分可以收書，如要細分則“J文學”一目不分書。在各類中“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學”、“毛澤東××學說”、“黨和政府的政策、決議和指示”的類號都從0開始，而且號碼是固定的。要進行總論復分時不在“J文學”類里復分而在“J1 文學理論與研究一般著作”下復分，例如：“文學辭典”的類號應該是J1053而不是J053。這樣就保證了J01、J011突出在最前面。

在二級類里，細分時“J2 中国文学”一目不分書，總論復分在“J21 中国文学理論與研究一般著作”下進行，這樣就保證了J2011、J2012在“中国文学”類中突出。

這裡產生一個問題，那就是基本大類和二級類目下有“一般著作”類目，需要細分時上位類不分書，有人說，這浪費了類目，對於這個問題，必須加以分析：是在較大類目中突出

“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毛澤東學說”、“黨和政府的政策、決議和指示”好，还是为了极少的書短一位号码，而把上述应加突出的書籍放在极不显著的地位好，我們認為前一种办法是对的。事实上，各类需要分入綜合类中的書并不多，而且設“一般著作”这一类目来加以容納，并不違反分类原則。不适当的強調极少数的書短一位号码，这是純粹从技术观点的角度来考虑的。好的标记制度，除了強調簡短、易記、易写等求要外，还必須強調标记制度如何能积极体现分类体系的思想性，这一原則，是我們在編制类号时必須深入加以研究的。

四

类号的长短与是否充分发挥了每个类号的作用有直接联系。在不影响表达內容即分类体系的思想性时，每一个类号都必須发挥它的作用。不然，就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現行分类法中，由于强调层次，造成較短的类号无書，而有書的类号都是較长的。如：

“科院法”

44.4	曲、戏剧(剧本)
.41	曲
.411	总集
.412	别集
.413	散曲
1	总集
2	别集
.414	杂剧
1	总集
2	别集
.415	传奇
1	总集
2	别集

我們知道，所有的曲集，不是总集就是别集。所有的杂剧集不是总集，也就是别集。这样，相对較为簡短的类号44.41、44.413、44.414、44.415都是有号无書的，如果把这些空号用来容納总集的書，有很多类的号码就可以短一位，这样做，并不給任何方面帶來困难。

“武大法”在配置号码方面，較为注意了發揮每个类号的作用。不强求层次，如：

J 62 民間文学研究及作品集

- 621 理論与研究
- 623 創作方法、創作經驗
- 624 作家論、作品研究
- 625 史
- 626 傳記
- 627 作品集(总集)
- 628 作品集(別集)

如果上例“作品集”要表达层次的話就成为：

J 627 作品集

6271 总集

6272 別集

这样一来，J627就是无書的号码，这是种浪费，在今后編制分类法时是必須加以克服的。

类号的配置要求达到取号时直接简单，要摆脱不必要的周折，这对实际工作者是有莫大的好处的。

我們目前有的分类法，过于強調編制的技术性，以致在分書时要很費一番周折，才能得到需要的号码，直接影响到分类工作效率。如：

“科学院法”

28.4-5 其他各国經濟

註：依国分，用附表六：人民民主国家得再仿28.3分，其他国家得依下表細分：自然区域細分时前面加“0”。例：欧洲經濟地理为28.5109。

照这个办法細分一本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国国民經濟恢复与发展的書，要經過三次周折才能得到需要的分类号。首先要查附表六的国別号，再按“28.3 苏联 經濟”分“28.34 經濟建設諸問題”下註：得仿“28.24 中国 經濟建設諸問題”分，再到28.24类目下才找出“国民經濟与发展”这样一个类目。有的类所仿的类目，相距2-3頁之远，使人查找不易，給分类工作者帶來了长年累月的困难。仿分的理由主要是节省篇幅，事实上类目相距很远的仿分所花的时间和人力已經远远超过所节省篇幅的代价，所以仿分的类目必須距离很近，如果远了，最好在有關类里把細目列出来。

在取号簡單，直接問題上，还有另外一方面，那就是类目的号码要尽量做到全部标出来，分类取号时可以省去連貫类号的时间。現行分类法中，有的下位类的号码不标它隶属的上位类的号码，如“人大法”在每頁前不标明上位类的号码，以致取一本書的类号要花一番查全类号的时间。如：要分一本“碳水化合物”的書，类号是13.44329..。要得到这个号码要花一番連貫类号的时间。“武大法”在这問題上前进了一步，类号全部在类目前面标出来了，这样在分类时，就显得方便了。

标记制度之是否完善，直接影响到分类表的使用，我們在强调分类体系的思想性，科学性的同时，对标记制度也必须加以细致的研究，因为“图书馆工作者利用着号码排列书架上的书籍，排列目录中的卡片，作统计的计算以及其他等事。因为办理借书工作及整理书籍，一个图书馆员，在一日之内，须要书写，阅读，念诵和记忆各种号码好几百次。号码能使读者在目录中找到他所需要的门类。标记越简单，越能图书馆员的劳动合理化，并能使读者容易利用图书馆的目录。如果号码编制得不适当，甚至就会使分类上很整齐的体系减低价值”①。

註解

- 图書館目录 刘国鈞等編 1957 高等教育出版社 218頁
- 論苏联圖書分类法草案 杰斯林科著 1955 文化部社管局編印 28頁
- 同 上 28頁
- 同 上 28頁
- 同 上 29頁
- 中国大学圖書館分类法評介 皮高品。
- 論苏联圖書分类法草案 杰斯林科著 1955 文化部社管局編印 27頁
- 图書館技术 克連諾夫著 1954 时代出版社 46頁